

我们总是容易被暂时的假象蒙蔽，所以，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主任 Ricardo Hausmann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从全球的角度，告诉我们，大逻辑其实是：新的波动期正在展开。当然，我们也可以质疑：中国是否可以例外？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建议你从《权威主义视角下的中俄改革比较》中寻找蛛丝马迹。

导读

特稿 >

新兴市场派对的结束

文 / Ricardo Hausmann 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主任

对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来说，2003—2011 年期间的名义 GDP 增长来自贸易条件改善、资本流入和实际升值。但现在这些均值回归过程将出现

智库 >

全球经济金融进入新的周期性转折点

文 / 朱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副总裁

原有的周期行将结束，新的周期尚未形成，全球经济金融进入一个新的波动期

大宗商品：从繁荣到萧条

文 / David Jacks 哈佛商学院和圣保罗大学教授

我们生活在一个稀缺的世界。各种大宗商品在供求上的差异造成了价格走势的分化，不仅过去是这样，而且未来可能同样如此

制造业撤离中国的节奏及投资机会

文 / Sammy Suzuki 联博投资公司新兴市场价值股票研究部门主任

制造业从中国的撤离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投资者需要了解这些变化正在如何展现

核能：复兴还是衰落

文 / 麦可·施耐德 国际能源与核电政策专家 安东尼·福罗格特 能源智库 Chatham House 的资深研究员


自从核电产业从 21 世纪初开始其公关活动以来，测算成本增加约 7 倍，而利润节节下降。过去 10 年中实现发电的 34 座反应堆平均建设工期为近 7 年，但只贡献了 26GW 的装机容量

权威主义视角下的中俄改革比较

文 / 姜希伦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从“传统型”、“克里斯玛型”以及“合法—合理型”三种权威类型的视角出发对中俄改革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中俄两国对待“权威”的不同，导致两国所选择的改革道路和取得的实际效果的不同

出品：

高和  中国商业地产基金的领跑者

信睿  智库

制作：
《经济导刊》

编辑信箱：
zhangsanyou@citicpub.com

征订信箱：
zhangchen@gohighfund.com

预告：
下期《高和·2049 论坛·智库精选》
将于 9 月 30 出品
敬请期待！



特稿 >

新兴市场派对的结束

对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来说，2003—2011 年期间的名义 GDP 增长来自贸易条件改善、资本流入和实际升值。但现在这些均值回归过程将出现，这也意味着新兴市场之前的卓著表现不可能马上重现

文/Ricardo Hausmann

今年，人们对新兴市场的热情开始退潮，这不仅是因为美联储计划削减其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新兴市场股票和债券今年出现了下跌，经济增长也出现了减速。要理解原因，了解以下它们如何走到今天是有裨益的。

用当前价格衡量，2003—2011 年间美国 GDP 累计增长了 35%，英国、日本和德国分别增长了 32%、36% 和 49%（均为美元值）。与此同时，巴西名义 GDP 增长了 348%，中国增长了 346%，俄罗斯增长了 331%，印度增长了 203%（也是美元值）。

而出现繁荣的并不止于所谓的金砖国家。哈萨克斯坦产出扩张了 500% 多，印尼、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卢旺达、乌克兰、智利、哥伦比亚、罗马尼亚和越南也都增长了 200% 以上。这意味着超市、餐饮公司、百货商场、电信、电脑商店和中国摩托车厂商的平均销售额增长与这些国家旗鼓相当（以美元计）。公司明智的做法是进入美元销售额增长快的地区，而对于资产管理来说，应该把钱投向美元 GDP 增长最快的地方。

你或许会把新兴市场的这一卓越表现解释为这些经济体生产的真实物品数量增加。但这大错特错了。以巴西为例。其 2003—2011 年间的名义 GDP 增长比中国还要强劲，但只有 11% 是真实（经通胀调整的）产出增长带来的。其他 89% 来自同期美元价格 222% 的增幅，因为本币价格增长快于美国的价格，且汇率也在升值。

某些价格涨幅来自巴西出口的商品。这体现于巴西贸易条件（出口品相对于进口品的价格）改善了 40% 之中，同时也意味着同样多的贸易量所转化成的美元数量增加了。

俄罗斯的经历与之类似。真实产出增长只能解释 2003—2011 年间名义美元 GDP 值增幅的 12.5%，其余增幅要归因于石油价格的上涨——这使俄罗斯贸易条件改善了 125%——以及卢布对美元实际升值 56%。

相反，中国的真实增长是巴西和俄罗斯的三倍，但其贸易条件实际恶化了 26%，因为其出口制造品变得更便宜了，而进口的大宗商品变得更贵了。在主要新兴国家名义美元 GDP 增长中，真实增长只占 20%。

提振名义 GDP 的三大因素——真实产出增加、出口相对价格上涨和实际汇率升值——并不是逐一独立作用的。增长较快的国家，实际汇率升值通常也较快，这种现象被称为巴拉萨-萨缪尔逊效应。贸易条件改善的国家，其增长通常也较快，其实际汇率升值也较猛，因为出口利润增加导致的国内支出扩张了经济，也让美元相对充裕（因而更加便宜）。

实际汇率还可能因为资本流入而升值，这反映出外国投资者热衷于该问题国家的前景。比如，2003—2011 年，土耳其的资本流入增加值接近 GDP 的 8%，这部分解

以巴西为例。其 2003—2011 年间的名义 GDP 增长比中国还要强劲，但只有 11% 是真实（经通胀调整的）产出增长带来的。其他 89% 来自同期美元价格 222% 的增幅，因为本币价格增长快于美国的价格，且汇率也在升值

释了 70% 的美元价格增幅。实际升值还可能产生于让国家陷于危险境地的前后不一致的宏观经济政策，比如阿根廷和委内瑞拉。

区分这些不相同又相互关联的因素很重要，因为其中一些显然已经不可持续。总体而言，贸易条件改善和资本流入不会持久：它们要么稳定下来，要么最终逆转。事实上，贸易条件没有长期趋势，有很强的回归均值倾向。石油、金属和粮食价格自 2003 年以来增长迅猛，在 2008—2011 年间创出了历史高位，但没人预计未来还会出现如此价格涨势。争论在于价格是会维持现有水平还是下跌，而粮食、金属和煤炭价格已经开始了下跌。

资本流入及其造成的实际汇率升值压力亦然。毕竟，外国投资者把钱投给一个国家是因为他们预期在未来可以带着更多的钱离开；当这一幕发生时，增长会放缓（如果不发生崩溃的话），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爱尔兰就是如此。

在一些国家，比如中国、泰国、韩国和越南，名义 GDP 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真实增长推动的。此外，根据即将发布的《经济复杂性报告》（Atlas of Economic Complexity）的数据，这些经济体开始生产更复杂的产品，这是可持续发展的先兆。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加纳和尼日利亚也有着令人瞩目的真实增长，但名义 GDP 是由极大的贸易条件效应和实际升值提振的。

但是，对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来说，2003—2011 年期间的名义 GDP 增长来自贸易条件改善、资本流入和实际升值。这些均值回归过程将回归，这意味着近期的卓越表现不可能马上重现。

在大部分国家，GDP 增长的额美元值大大超过了真实增长预期，也不符合巴拉萨-萨缪尔逊效应。对这些国家来说，在荣景时期推动美元值 GDP 增长的动态将起到相反的作用：稳定或降低出口价格将削弱真实增长，导致货币停止升值甚至实际贬值。无怪乎派对结束了。

（作者系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主任）

智库 >

全球经济金融进入新的周期性转折点

原有的周期行将结束，新的周期尚未形成，全球经济金融进入一个新的波动期

文 / 朱民

一、全球经济下滑，危机以来以刺激政策带动的反弹周期趋于结束

2013 年第二季度开始，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先是德国受欧元区南部地区经济继续衰退的影响，投资、工业生产和出口速度下降，预计全年经济增长速度较大幅度地低于市场年初预测，将低于 2012 年。法国经济继续下滑，预计全年经济增长速度从 2012 年的零增长降到负增长，意大利和西班牙经济继续衰退。进入第三季度后欧元区经济有出现企稳迹象，但整体欧元区全年经济将继续衰退，和 2012 年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当。美国经济受财政削减制约和外部经济环境影响，第二季度工业生产和出口增长都疲软，虽然居民消费和住房业恢复强劲，但美联储宣布准备调整宽松货币政策后，住房贷款利率上升，住房贷款申请开始下降。预计全年经济增长速度稳定在 1.7% 左右，较 2012 年 2.2% 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新兴市场经济和发展中国家受发达国家经济增速下滑影响出口下降，财政支出力度下降和国内消费疲软影响，增长速度较大幅度放慢，预计亚洲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将放慢到 5.8%，**低于 2012 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一个百分点。拉丁美洲新兴市场经济全年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到 3.0%。

这是全球经济增长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反弹的连续 4 年下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

目前全球总需求疲软，各国普遍缺乏外部需求，这一切制约了经济继续增长的空间。全球经济在 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由大规模刺激政策推动的经济增长的第一个经济周期开始趋于结束

在 G20 推动下，各国相继推出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全球经济反弹强劲，2010 年全球经济增长 5.2%。但 2011 年欧元危机爆发，欧元区经济增长速度从 2010 年的 2.0% 下降到 1.4%，整体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从 2010 年的 3.0% 下降到 1.6%。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强劲，但整体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到 4%。2012 年欧元危机继续，经济负增长进入衰退，美国经济受财政削减和欧洲经济衰退影响，保持中度经济增长，整体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继续下降到 1.2%。整体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仍然强劲，但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继续下降到 3.2%。今年以来，在外部需求疲软下，新兴经济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也开始下滑，预计全球经济增长将降低到 3% 左右。

目前全球总需求疲软，各国普遍缺乏外部需求，出口和工业增长乏力，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加上消费者信心持续下降，国内居民消费继续疲软和投资不振，这一切制约了经济继续增长的空间。全球经济在 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由大规模刺激政策推动的经济增长的第一个经济周期开始趋于结束。

二、美国开始放缓量化宽松，危机以来的货币宽松周期趋于结束

5 月 22 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暗示美联储将可能逐渐放缓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市场担忧美国宽松货币政策退出会引发流动性紧张，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大幅波动。美国 10 年期国债利息迅速上升，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美国 10 年期国债利率上升了一个百分点。美国国债利率上升引发全球国债利率水平不同程度的上升，欧元区的利率水平平均上升 0.5 个百分点，英国的利率水平上升 0.8 个百分点，整体发达国家的利率水平平均上升 0.7 个百分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利率水平平均上升 0.9

个百分点。美国货币政策变化引发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发达国家大量资金流出债市，流入股市；大量国际资金流出新兴经济市场国家的债市和股市，南非、墨西哥、巴西、印尼、印度、土耳其等新兴经济市场国家都出现资金外流，引起债市利息上扬，并引发股市下跌和本币贬值，一时间有些国家的股市下跌和本币贬值超过10%。出于对日本经济金融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日本金融市场大幅波动，股市下跌，国债利息上扬，日元汇率波动。

由于全球经济恢复不同步，美国经济在住房、居民消费和出口的带动下恢复强劲。但2013年政府消减开支达2.5个百分点的GDP，影响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左右。2014年政府开支下降的影响降缓，经济增长可能恢复到2.5%左右。在经济增长稳健的预期下，美联储必然撤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后，美联储温和了发言的语调，但仍然表示会从今年年末和明年开始逐渐撤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美联储的明确信号已经表明非传统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已经开始转向，市场预期也已经开始变化，资产重新配置和定价已经开始，全球利率已经上扬。这一切表明危机以来的以非传统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代表的宽松货币周期趋于结束

美联储的明确信号已经表明非传统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已经开始转向，市场预期也已经开始变化，资产重新配置和定价已经开始，全球利率已经上扬。这一切表明危机以来的以非传统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代表的宽松货币周期趋于结束。

三、全球经济将进入中低速调整阶段，金融市场将持续波动

原有的周期行将结束，新的周期尚未形成，全球经济金融进入一个新的波动期。

全球经济方面，虽然危机以来以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反弹的周期已经趋于结束，下一个经济周期的发展方向并不明确。经过了四年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各国普遍面临财政政策空间大大缩小，财政上都需要进行新一轮的财政整合来重建财政空间，非传统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下，利率水平也将开始上升，进一步刺激经济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空间都非常有限。

欧元区经济继续受到资产负债表的压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都疲软，潜在金融风险不容低估，整体经济将处于衰退和弱增长中。美国经济受到财政削减的影响，虽然经济继续恢复但增长速度低于预期。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受到欧美同时经济增长下滑，外部需求不振引发出出口下滑，国内投资减速，公共部门支出削减，国内消费疲软，经济增幅会继续下降。由此，全球经济三大主要板块经济增长相继下滑，缺乏明确的经济增长拉动者。

全球经济整体债务水平仍然居高不下，将继续影响投资和消费，影响经济增长。

发达国家的政府总债务在未来5年内都会在GDP的110%水平以上，居民债务在危机中有所下降，但仍然高企，欧洲的公司债务和银行债务仍然高企。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债务虽然较发达国家整体债务水平仍然较低，但在危机中动用较多的财政资源和金融市场资源、政府债务、居民债务、公司债务和银行债务在过去5年中都在上升，也正在形成新的风险点。整体全球债务调整将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也是经济增长的负面因素。

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后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刺激获得的时间和空间受到欧元危机和美国财政约束的冲击，并未换来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及产业创新和发展。全球经济缺乏新的领头行业，全球的兼并重组活动为历次危机后最低。全球需要积极的结构调整。欧元区需要继续去杠杆化，化解欧元内在的体制性矛盾，同时通过经济结构调整支持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美国经济目前基本在延续危机前拉动总需求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努力，也需要根据全球化的变化调整经济结构。新兴经济和发展中国家也需要平衡外部需求和内部需求、平衡消费和投资的结构调整。

金融市场方面，随着美国非常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逐渐撤出，全球的金融利率

水平会继续上升，全球流动性会逐渐收紧。由于欧洲和日本需要继续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全球会出现主要货币体系（美元、欧元和日元）之间政策的不同步，这也会加大全球货币市场、利率市场和汇率市场以及全球资本流动的波动。

货币政策的变化不但改变利率水平，也在改变金融市场的风险偏好，引发金融资产重新定价。美国金融市场的债券和股票的回报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全球不同金融市场的不同金融产品也会被重新风险定价。全球金融资产组合将发生变化，全球资本市场资产配置变化继续改变全球的资金流向，美联储暗示缓和非常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后，虽然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债市、股市和货币市场大幅波动，但资金流出量占新兴经济体当地金融市场规模小于1%。非常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际开始撤出后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冲击不可低估。

非常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一次规模巨大的市场干预，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已经扩张到了3.5万亿美元。从逐步减少目前的850亿美元金融资产购买，到3.5万亿美元资产负债表的逐渐回缩，这将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其间要维持债券市场和其他金融证券市场的供求平稳，也非易事。本次非常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工具繁多，可能的操作组合也相当复杂，较容易产生政策的不透明性和市场的误解，这一切都会加大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在美联储2010年宣布即将开始采用非常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时，美联储的宣布对市场的影响远远小于美联储实际进入市场开始实施操作对金融市场的冲击。而这次由美联储预警退出就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如此大的波动出乎市场的意料。

综上，全球经济增长总需求不足，各国再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空间已经大大压缩，总供给缺乏活力，债务整体偏高，经济结构调整滞后，短期内经济增长上升空间有限，目前难以看到拉动全球经济再次上扬的动力。金融市场上，非常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无以往经验可循，操作的技术难度高，时间长，不可预测的未知因素大量存在。而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金融的关联性高度增加，

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金融的关联性高度增加，各国经济金融相互影响，特别是目前经济政策和经济金融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又相互影响，增加了潜在波动的可能。整体上，不确定性在增加，全球经济金融进入一个新的波动阶段

各国经济金融相互影响，特别是目前经济政策和经济金融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又相互影响，增加了潜在波动的可能。整体上，不确定性在增加，全球经济金融进入一个新的波动阶段。

（作者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

美国非常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逐渐撤出，欧洲和日本需要继续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全球会出现主要货币体系（美元、欧元和日元）之间政策的不同步，这也会加大全球货币市场、利率市场和汇率市场以及全球资本流动的波动

大宗商品：从繁荣到萧条

我们生活在一个稀缺的世界。各种大宗商品在供求上的差异造成了价格走势的分化，不仅过去是这样，而且未来可能同样如此

文 / David Jacks 编译 / 朱振鑫

曾经，每一代人都能见证一次或两次大宗商品的繁荣周期。

每一次繁荣周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全球经济很快陷入关键材料的短缺，而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减速直至陷入停滞，进而导致国家之间的冲突加剧（Moyo, 2012）。

很多投资界人士同意这种观点，但他们同时认为在价格上涨的过程中也创造了大量的财富（Heap 2005, Rogers 2004）。

相反，经济学家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大宗商品实际价格的长期历史已经否定了这一点，大量分析大宗商品价格与制成品价格的学术和政策文献为此提供了依据（Grilli and Yang 1988, Harvey et al. 2010）。

他们认为，全球进入大宗商品繁荣期之后，总会释放强烈的价格信号，进而引发供给端的缓冲反应。之前沉寂的勘探和开发活动会随之活跃起来，缓解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势头。

上述讨论中忽略了两点：一是连贯一致的大宗商品价格数据，二是连贯一致的刻画长期价格走势的方法。

原有价格的新数据

为此，本文构建了一个覆盖 32 种大宗商品、长达 164 年的全新的大宗商品实际价格数据库（公开可用）。这些数据覆盖的大宗商品范围非常广，包括动物制品、能源产品、粮食、金属、矿产品、贵金属和软性大宗商品等。2011 年这些大宗商品总价值 8.26 万亿美元。该样本还考虑了可能出现的重复计算和异常数据情况，因此可以有效代表全球经济活动。

大宗商品实际价格的趋势、周期和阶段

我最近的一篇文章就和这个主题有关，完整地记录了 1850 年以来大宗商品实际价格的历史走势（Jack 2013）。根据我们的数据，大宗商品实际价格可以分解成长期趋势、中周期和短期繁荣 / 萧条阶段。在此基础上，我们有以下重要发现：

时间区间的长短以及构建价格指数时各种商品的权重在观察和认识大宗商品实际价格时具有重要影响。

如果按照 2011 年的产值进行加权，大宗商品实际价格自 1900 年以来已经上涨了 244.69%，自 1950 年以来上涨了 177.59%，自 1975 年以来上涨了 38.9%。如果按照 1975 年的产值进行加权，大宗商品实际价格自 1900 年以来已经上涨了 165.84%，自 1950 年以来上涨了 117.57%，自 1975 年以来上涨了 10.8%。这意味着很多关于大宗商品实际价格的常识可能都过于“悲观”，或者受到了非常遥远或临近的事件的过度影响。另外，“地下大宗商品”（能源产品、金属、矿产品和贵金属）和“生长型大宗商品”（动物制品、粮食和软性大宗商品）之间可能存在巨大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被低估了。数据表明“地下大宗商品”的实际价格经历了长期上涨，而相比之下，“生长型大宗商品”的实际价格经历了长期下跌。

大宗商品价格存在稳定的超级周期，即可能会出现长达数十年的正向趋势偏离。

大宗商品价格的超级周期被视为价格向上波动的广义的中周期，时间大概在 10

到 35 年 (Cuddington and Jerrett 2008, Erten and Ocampo 2012)。这种上涨一般和大规模工业化和城市化带动的需求上涨有关，很多产品还会受到短期产能约束的影响——尤其是能源、金属和矿产品——进而导致大宗商品实际价格形成长达数年甚至十年的向上偏离。这种现象展示了大宗商品实际价格指数的对数、其长期趋势线以及根据去趋势实际价格估算的超级周期价格。

分开来看，样本选取的 32 种大宗商品中有 16 种正处于超级周期之中，从 1994 到 1999 年开始，实际价格出现正向的趋势偏离。这些大宗商品价格超级周期均起源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这凸显了本篇论文的一个重要主题：2000 年左右大宗商品价格达到了数年甚至数十年以来的低点，近年来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很大程度是一种触底反弹。与此同时，从历史经验来看，目前的超级周期可能已经达到峰值。

我的论文还提供了一种方法论，可以用于判别大宗商品价格的繁荣和萧条周期以及前面提到的大宗商品超级周期。

历史上，上述繁荣 / 萧条阶段存在一些明显的特征：在名义汇率自由浮动的时期，通常会出现时间更长、幅度更大的大宗商品价格繁荣和萧条周期，过去 40 年就是如此。

历史上，上述繁荣 / 萧条阶段存在一些明显的特征：在名义汇率自由浮动的时期，通常会出现时间更长、幅度更大的大宗商品价格繁荣和萧条周期，过去 40 年就是如此

结论

上述结果表明，决策者和研究人员可能应该避免两种相反的倾向：

首先，决策者不应该对大宗商品实际价格的周期趋势感到困惑。

有必要采取措施从根本上认清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及其顺周期性，这涉及到私人部门的投资和公共部门的收入。

其次，研究人员——尤其是学术机构——应当更加明确地认清一个事实：我们的确生活在一个稀缺的世界，而且各种大宗商品的供求差别会导致其价格走势的分化，不仅过去是这样，未来可能同样如此。

(本文作者是哈佛商学院和圣保罗大学教授。文章摘编自 2013 年 VoxEU8 月刊)

制造业撤离中国的步奏及投资机会

制造业从中国的撤离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投资者需要了解这些变化正在如何展现

文 / Sammy Suzuki 译 / 陈玮

过去十年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制成品出口引擎，以及金砖四国时代的核心新兴市场国家。但来自其他国家日益激烈的竞争，正在促使制造业逐渐撤离中国。投资者接下来应该如何应对呢？

虽然很难想象一个没有中国作为制造业超级大国的世界，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在全球范围内也曾经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出口国。过去三十年以来，中国一直持续赢得市场份额，而且自 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更是加快了增长步伐。

中国的市场份额增速正在趋平

中国花费了二十五年的时间，才占据了美国进口总额中的第一个 10%，然而仅仅在九年之后这个比例就上升到了 20%。到 2010 年，中国在美国进口总额和制成品进口额中分别占据 19% 和 29% 的比重。然而，自 2010 年以来，由于劳动力成本持续攀升以及竞争加剧，中国的市场份额增速已经开始趋平。

投资者对此其实不应该感到意外。全球制造业中心的长期变迁实际上是相当寻常之事。例如，从五十年代开始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日本都是全球的一个主要出口国——在 1986 年巅峰时占美国进口总额 20% 的份额。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竞相效仿日本。但在八十年代中期本币汇率大幅升值从而使得出口产品价格相对昂贵之后，日本和中国台湾让出了他们的领先地位。

哪些行业易受影响？

今天，我们认为投资者应该密切关注中国最易受到影响的行业。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 (U.S. Census Bureau) 最近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在服装、玩具、电子消费品、电脑与配件以及机械设备行业已经可以看到一系列疲软的迹象。2010 年美国从中国大陆进口服装的所占份额从 2001 年的 8% 跃升至 40%。同期美国从墨西哥、多米尼加共和国、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进口服装的所占份额从 25% 下跌至 12%。然而，过去两年半以来，中国在美国服装进口额中所占的市场份额已经下滑了超过 5 个百分点，而这部分份额让越南、孟加拉国、印度和印尼瓜分了。

越南是一个大赢家

过去十年以来，越南一直是一系列自由贸易协定（包括在 2007 年加入世贸组织）的大赢家。耐克在越南生产的鞋子已经在该公司总产量中占到四成比重——超过了中国。我们认为，投资者应该留心鞋类与服装行业中其他跨国公司以及他们的供应商，因为他们通过向中国以外地区扩张，可能获得显著的成本效益。

即便在产品这类在中国看似很有韧劲的行业中，变化也是即将发生。**中国尽管拥有强大的供应商体系以及其他竞争优势，但其市场份额的增长已经处于停滞状态，而越南的市场份额已从一个极低的基础上翻了一倍。**继 2010 年的英特尔之后，三星、诺基亚及其他电子产品制造公司都已纷纷在越南投资建厂。

墨西哥受到汽车行业的关注

中国尽管拥有强大的供应商体系以及其他竞争优势，但其市场份额的增长已经处于停滞状态，而越南的市场份额已从一个极低的基础上翻了一倍

中国旨在向汽车、航空航天零部件和工业设备等更高端的制造行业进军的雄心可能会因为墨西哥的横刀夺爱而搁浅。随着大众、日产和本田等全球汽车制造商在有竞争力强的劳动力成本以及优惠贸易协定的诱惑下，日益把墨西哥作为一个出口基地，墨西哥的汽车产量在未来五年内有望从2012年的290万辆上升至400万辆。

我们认为，墨西哥和越南目前正处于有利的境况之中，有望在世界出口领域中赢得市场份额，而印度、孟加拉国和印尼也很有可能会在制造业从中国的撤离中起到一定的作用。制造业从中国的撤离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而且一些中国公司将会通过移向价值链上游或者自身也转战海外来应对这些挑战。投资者需要了解这些变化正在如何展现，以此确定那些有望从中国制造业的霸主地位日益动摇中获益的公司。

（作者是联博投资公司（Alliance Bernstein）旗下新兴市场核心股票基金投资组合经理，兼新兴市场价值股票研究部门主任。文章摘编自《福布斯》）

核能：复兴还是衰落

自从核电产业从 21 世纪初开始其公关活动以来，测算成本增加约七倍，而利润节节下降。过去十年中实现发电的 34 座反应堆平均建设工期为近七年，但只贡献了 26GW 的装机容量

文 / 麦可·施耐德 安东尼·福罗格特

去年 6 月，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总干事天野之弥宣称“在未来数十年中，核力量将在可持续发展方面起到日渐增加的重要作用。”

在耗费了 10 亿美元后，美国最大的电力公司杜克能源公司（Duke Energy）搁置了其在佛罗里达州建设两座反应堆的计划。此前三个月，该公司刚刚宣布放弃北卡罗来纳州的两座核反应堆投资。

事实上，今年有四家美国电力公司决定永久关闭总共五座核反应堆——这是 15 年来美国首次关闭核反应堆。其中一座——威斯康辛州的吉瓦尼电站（Kewaunee Power Station）——在投入了大量资金、获得了 60 年的许可证续期后遭弃；其原因是它无法以具有竞争力的价格产出电力。出于同样的理由，生产许可 2032 年才到期的佛蒙特扬基电站（Vermont Yankee）也将于 2014 年关闭。

类似地，世界上最大的核电公司——法国国家控股的法国电力公司（EDF）——宣布即将退出美国核电市场。该公司有 20 亿美元因为项目遭弃而打了水漂。此外，为了弥补急剧增加的经营成本（去年因此造成 15 亿欧元或 20 亿美元损失），EDF 今年将把法国电价平均提高 5%，并在明年再提高 5%。在截至 2013 年 3 月的五年中，EDF 股价下跌了 85%。类似地，**2008—2012 年间，世界上最大的核电建设商——法国国家控股的阿海珐（AREVA）公司——股价下跌了 88%。**毫不奇怪，投资者对两家公司的新战略计划相当欢迎，对 EDF 退出美国市场的决定亦然，两家公司股价下跌的压力有所缓解，但会维持多久还有待观察。

2008—2012 年间，世界上最大的核电建设商——法国国家控股的阿海珐（AREVA）公司——股价下跌了 88%

核能产业的衰落始于几十年前。但是，自 2011 年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三座反应堆出事故以来，其衰落速度大大加速了。事实上，2012 年，全球核电发电量前所未有地下降了 7%，超过了前一年创下的下降 4% 的记录，也使核电发电量较 2006 年的历史最高水平减少了 12%。

发电量下降的四分之三来自日本，在日本 50 座处于正式运行的核反应堆中，只有两座在实际产出电力。尽管如此，其他 16 个国家，包括世界五大核电生产国，发电量也在下降。结果，2012 年核电站世界总发电量的比例下降至 10% 左右，而 1993 年的峰值为 17%。只有捷克去年的核电比例达到了历史最高值。

此外，在全世界 66 座在建核反应堆中，三分之二坐落于三个国家——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其中中国一国占了 28 座。其中 9 座核反应堆列入“在建”名单已经超过了二十年。（田纳西州的瓦茨巴（Watts Bar）2 号反应堆保持着在建时间记录，已经长达 41 年。）另有四座在建时间已经超过十年。

总体看，这 66 座反应堆中至少有 23 座被延长过工期，许多已经在建多年。其他项目——全部在过去五年中开工——是否能按期进展还未可知。由于工期延长，去年只有三座新反应堆开始运转——只有被关闭反应堆数量的一半。当前，全球核反应堆平均运行时间是 28 年，而且还在稳步增加。

即使在廉价页岩气正在重写能源产业格局的美国，去年新进入电网的风电也高于火电，而在今年前三个月，80%的新增发电能力来自可再生能源

相反，新的可再生技术正在赢得动力，这反映出国际能源政策和投资战略的根本性转变。去年，中国、德国、日本和印度的可再生电力首次超过了核电。在中国和印度，光是风电便已超过核电。

自2000年以来，全球离岸风电发电量平均每年以27%的速度增长，而太阳能光伏发电增长率更是达到了惊人的42%。去年，全世界新增45GW风能和32GW太阳能，而核电仅仅增加了1.2GW。

主要发达国家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向尤为积极。比如，德国以加快可再生能源部署作为退出核能的补充，每个月都有3000MW的太阳能光伏电力接入德国电网。因此，在过去七年中，太阳能电力的每千瓦成本降低了四分之三。

即使在廉价页岩气正在重写能源产业格局的美国，去年新进入电网的风电也高于火电，而在今年前三个月，80%的新增发电能力来自可再生能源。

在过去十年中，核电产业试图用以“核复兴”概念为核心的宣传吸引全球领导人的注意。但它们的承诺——包括每1000瓦建成发电量投资成本1000美元、建设工期四年——并没有实现。

事实上，自从核电产业从2000年代初开始其公关活动以来，测算成本增加了大约七倍，而利润节节下降。过去十年中实现发电的34座反应堆平均建设工期为近七年，但只贡献了26GW的装机容量——还不到太阳能电和风电一年的增加值的三分之一。

IAES的乐观语气掩盖不了基本算术：极高的维护支出和福岛事故后的巨额升级成本以及无法在不获得政府大量补贴的情况下创造出有竞争力的新产能正在摧毁核能产业。正如经济学家马克·库珀（Mark Cooper）所说，核能实际上在经历“复衰”。

（作者麦可·施耐德为国际能源与核电政策专家；安东尼·福罗格特为能源智库Chatham House的资深研究员）

权威主义视角下的中俄改革比较

从“传统型”、“克里斯玛型”以及“合法—合理型”三种权威类型的视角出发对中俄改革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中俄两国对待“权威”的不同，导致两国所选择的改革道路和取得的实际效果的不同

文 / 姜希伦

中俄两国在 20 世纪末开始的改革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效果。权威主义这一政治概念主要是指一种介于极权政体与民主政体之间的政治秩序。从“传统型”、“克里斯玛型”以及“合法—合理型”三种权威类型的视角出发对中俄改革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中俄两国对待“权威”的不同，导致两国所选择的改革道路和取得的实际效果的不同。

普京时代俄罗斯向权威主义的复归、中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都说明权威主义是在告别极权制度而新的社会秩序尚未确立的情况下，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政治秩序。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和国情现实的制约，权威主义是后发现代化国家进行改革、促进社会转型和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普京时代俄罗斯向权威主义的复归、中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都说明权威主义是在告别极权制度而新的社会秩序尚未确立的情况下，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政治秩序

20 世纪末中俄两国在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下开始了改革。30 多年过去了，两国走过了截然不同的历程，产生了不同的效果：近 10 年来，“中国经济以 10.7% 的平均速度，高于同期世界经济 3.9% 的年均增速”。2011 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自 90 年代苏联解体俄罗斯实行休克疗法以来，俄罗斯经济陷入了困境之中。普京上任后的 2000—2006 年期间，俄罗斯经济开始恢复，但直到 2007 年，GDP 才恢复到 1990 年的水平。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政治秩序的稳定合法对于改革的意义十分重大，任何政治秩序，若有能力形成并维护一种使其成员确信现行政治制度对于该社会最为适当的信任，则其有统治的权威与合法性。权威主义恰恰给转型国家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以充分支持。考察权威主义这一政治理论，我们可以看到中俄改革在对待“权威”上的不同，导致二者选择改革道路和取得实际效果的不同。

一、对权威主义的认识

“权威”(authority)，可以定义为“正当的权力，是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是发挥此影响的权利”，“是披着合法和正当外衣的权力”。“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ism)这一政治学概念，是相对于“极权主义”而言的，也可称之为威权主义、威权政治或权威政治。权威主义最早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由西方学者沃洛林提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权威主义更多的与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的内涵相一致。20 世纪 60 年代后，欧洲的葡萄牙、西班牙，拉美的阿根廷、巴西，东亚的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政治结构特点上发生了鲜明的变化：这些国家脱离了原有的专制极权制度，但也没有实现自由民主政治，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结构。随着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及“东亚奇迹”的出现，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关注这一政治结构，并赋予权威主义以新的内涵和意义，并逐渐将其中性化，作为一种客观的政治现象进行研究。

权威主义自提出以来，中外学者对其有着广泛的论述和讨论，但一直都没有形成一个明确清楚的学术界定。通过梳理比较，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权威主义政体是一种介乎于极权主义政体和民主主义政体之间的过渡性政治结构，它既有着专制集权色彩，也有着一定的民主因素；第二，权威主义自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兴起，直到今天仍然是很多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政治结构，持续时间较长；第三，权威主义具有世界性，既有欧洲国家，也有拉美、东亚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都存在进行国家转型和实现现代化的任务。**权威主义之“权威”是国家在转型时期构建其政治统治合法性、保障政治秩序稳定的重要来源。**马克思·韦伯概

权威主义之“权威”是国家在转型时期构建其政治统治合法性、保障政治秩序稳定的重要来源

括出三种权威类型：传统型权威（traditional authority）、克里斯玛型权威（charismatic authority）以及合法—合理型权威（legal—rational authority）。通过对权威主义的认识以及韦伯对权威类型划分的理论，我们可以对中俄改革进行分析与比较，探究权威主义对国家改革与转型的作用。

二、从权威主义出发比较中俄改革

1. “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与“公开性”

传统型权威是指确立已久的习俗和传统，是传统历史上形成的无需再进一步证明的权威。中俄两国都拥有漫长的中央集权的历史。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了中国两千多年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历史。俄罗斯虽然是一个传统的欧洲国家，但受拜占庭文化中的神权专制思想以及历时数百年的沙皇专制统治，中央集权主义一直占据着俄罗斯社会思想的统治地位并对后世影响深远。虽然近代以来俄罗斯产生了资本主义因素，但资本主义并没得到充分发展。无论是沙俄时期还是苏联时期，杜马一类的议会机构并没有像西欧国家一样发挥过作用，中央权威一直是主导国家变革的推动力量。

中国改革的鲜明特点，就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改革派始终强调坚持保持现存政治秩序的重要性，主张通过渐进的方式解决具体问题，在实践中自然演化出一个新的体制和系统。历史文化传统以及执政党自身实践的有效性，广大民众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认同中央的权威。“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由于极“左”错误对国家造成的巨大破坏和伤害，对于改革者而言最为迫切的任务是使国家和社会从极“左”思潮中解放出来，并重塑政府和改革的合法性与权威性。邓小平作为成熟的政治家，清楚地知道极“左”思潮对国家和人民的伤害，但他对执政党的错误批判是有节制的，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是有方向性的。他主持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一定程度上终止了对历史问题的争论，既批判了旧体制下的历史伤痛，又适可而止地淡化了人们对“左”倾错误的注意力以利于将国家重心转移到改革和转型上来，重塑并加强了执政党的权威，为大规模改革的开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对比中国改革，戈尔巴乔夫改革最大的特点之一是他提倡的“公开性”。公开性思想并非戈尔巴乔夫的首创，它最早由列宁提出并加以阐释。十月革命前，列宁在反驳经济派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指责时就指出，广泛的民主应该包含两个必要条件：

“第一，完全的公开性；第二，一切职务经过选举。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在此基础上，戈尔巴乔夫强调恢复历史真实，不留历史空白点，把历史真相告诉人民。从道德层面及长远角度来看，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创造者，有权利也应该知道历史真相。但是，**在改革之初还没有取得明显绩效时，深受斯大林模式以及恐怖政治之苦的苏联民众得知历史真相后，长期压抑的对苏共领导的不满情绪得到爆发且日益强烈，其结果是大大降低了苏共的执政权威，促进了大批反对派的涌现。**政治多元化现象的出现，有利于民主化的推动，但却不利于思想与改革方向的统一。民众的不满情绪得到了极大的宣泄，极权体制受到了全面深刻的批判，但却加深了社会认同与价值

在改革之初还没有取得明显绩效时，深受斯大林模式以及恐怖政治之苦的苏联民众得知历史真相后，长期压抑的对苏共领导的不满情绪得到爆发且日益强烈，其结果是大大降低了苏共的执政权威，促进了大批反对派的涌现

观的分裂。中央权威的丧失，加强了各类激进主义的政治力量，在这种反思和批判的大环境下民众越来越倾向于激进主义者的主张，最终执政党丧失了改革的话语权，无法实施稳定有序的改革方案，国家只能走向混乱与动荡。

2. 元老派政治精英与少壮派政治精英

克里斯玛型权威，指的是建立在个体人格力量与魅力上的权威。在这种权威里“领袖作为某种英雄或圣人有能力向追随者进行直接和个人的诉求，来发挥影响力”，突出表现在政治活动中个人的作用以及个人的活动对社会造成的影响。正如马克思所说：“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他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观察世界各国的改革历史，我们不难发现选择作为改革者的政治精英，存在一个普遍的矛盾：在较为封闭的官僚体制内，年纪较轻而有改革热情的少壮派缺乏体制内的经验、威望与影响力；与之相比，拥有深厚资历与政治资源的元老派却往往缺乏改革志向。中国改革成功的关键之一，正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元老派政治精英以改革者的身份走上了政治舞台。通常来讲，作为旧体制受益者的元老派很难成为改革者，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元老派既是极“左”思潮的亲历者也是受害者，这促使他们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思。

面对极“左”思潮给普通民众造成的巨大灾难，再结合自身遭遇，元老派迅速从带有空想社会主义与极权主义色彩的斯大林模式中摆脱出来，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成为坚定的改革者。元老派成为改革者，有着明显的优势：一方面，他们拥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对体制内的运作方式十分熟悉，可对改革的速度和广度有一个完整的把握，有利于在稳定中推动改革的开展。另一方面，他们在长期政治生涯中积累了大量政治资源，在社会层面也有着较高的权威与号召力，可以有效地团结改革力量，利用权威减少阻力降低改革的成本与代价。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元老派政治精英作为改革者登上政治舞台，既能够抵制党内的保守派势力，也能够抵制党外的激进民主势力，超越左右争论在左右之间避免过多的干扰从容进行结构调整，是中国改革能在稳定中前进的关键因素。

通常来讲，作为旧体制受益者的元老派很难成为改革者，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

戈尔巴乔夫拥有改革的决心与勇气，容易突破原有的思维定式，但他也有着少壮派政治精英的若干缺点

20世纪80年代，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等苏联领导人在短时间内相继去世，把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少壮派政治精英推上了政治舞台。戈尔巴乔夫拥有改革的决心与勇气，容易突破原有的思维定式，但他也有着少壮派政治精英的若干缺点：

缺乏体制内政治力量运作的经验、权威与影响力，没有雄厚的政治基础与政治资源，对外部力量的依赖性较大。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先从经济入手，他认为苏联“必须在短时期内进入最先进的科学技术领域，拥有世界上最高水平的社会劳动生产率。”但这一目标并没有实现，党内外出现了对其改革及其个人权威质疑的声音，这令戈尔巴乔夫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为了减少党内保守派的阻力，争得社会上激进民主派的支持，他将改革推进到政治领域。1988年他开始推行的选举制度，大大降低了执政党的权威与控制力，触动了苏共执政的合法性，进一步加强了激进民主派的力量。但是，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实现与激进民主派结盟的目的，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政治力量，反而利用民主化、公开性、反思历史等条件，进一步瓦解戈尔巴乔夫赖以进行改革的执政党资源与中央权威。而在苏共内部，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改革派都对戈尔巴乔夫不再信任。

“八一九”事件的发生，标志着苏共传统力量对戈尔巴乔夫的抛弃。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民主派也有着自己的计划和诉求，他们也没有选择支持戈尔巴乔夫。失去了左右两方力量的支持，戈尔巴乔夫无路可走，只能接受苏联解体这一事实。叶利钦执掌俄罗斯政权后，实施“五百天计划”，推行激进的休克疗法，使俄罗斯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之中，“1989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是中国的2倍强，而在十年后却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1/3”。改革需要极高的政治智慧与政治能力，缺乏元老派政治精英担当改革者，无论是苏联还是俄罗斯都无法实现改革的稳步前进，只能吞食激进变革带来的苦果。

这种改革模式，既有利于规范执政党的政治行为，处理好执政党和国家的关系，也有利于执政党对全局的掌控，保障改革在稳定中有步骤有层次地推进

3. 渐进主义与激进主义

合法—合理型权威指的是将“权威与界定清楚地一套法律规则联系起来”，通过规则来制约和限制公职人员的权力，赋予政府的权威性。

中俄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如何进行有效的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前，中俄两国都建立了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民主法治遭到破坏，党政不分现象严重。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将执政党与国家的领导制度作为政治改革的入手点。讲话中邓小平明确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改革的“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一方面，中国改革明确了宪法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法律对执政党的约束作用；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强调了“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并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了中共的执政党地位。这种改革模式，既有利于规范执政党的政治行为，处理好执政党和国家的关系，也有利于执政党对全局的掌控，保障改革在稳定中有步骤有层次地推进。

苏联在政治改革上采取了激进的民主化方式，在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民主化”思潮冲击下，苏共丧失了引导改革的能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日益被边缘化。受到东欧剧变的影响，戈尔巴乔夫对多党制表示认可，并在随后的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正式提出了修改宪法第6条的决议，取消苏共在国家政权中法定的领导地位。在苏共二十八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声明，苏共不再是法定的执政党，将起议会党的作用。在民主激进派的竞争下，苏共先后在多个共和国和地区丧失了执政地位。苏共丧失了对全国局势的掌控，改革不能在有序稳定的条件下进行，最终导致苏联的解体。戈尔巴乔夫改革不仅没有保证执政党对改革的主导权，反而在法律上否定了苏共的执政党地位。缺乏强大有效的政治力量保障，俄国改革只能走向一条混乱无序的道路。欧美式的民主制度并没有立刻给俄罗斯带来繁荣，反而使俄罗斯陷入严重的困境：分裂势力持续活动、恐怖主义愈发猖獗、经济形势急剧恶化、人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俄罗斯人的民主之梦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很快破灭了。

戈尔巴乔夫改革不仅没有保证执政党对改革的主导权，反而在法律上否定了苏共的执政党地位。缺乏强大有效的政治力量保障，俄国改革只能走向一条混乱无序的道路

戈尔巴乔夫改革不仅没有保证执政党对改革的主导权，反而在法律上否定了苏共的执政党地位。缺乏强大有效的政治力量保障，俄国改革只能走向一条混乱无序的道路。

三、中俄改革的启示意义

苏联解体之初俄国民众之所以企望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因为他们常常将民主与生活富足联系起来。可是，“休克疗法”的经济改革失败大大损害了激进民主派的声誉，打碎了民众对西方民主的幻想。面对激进民主化带来的残酷局面，广大民众迫切要求恢复国家社会原有的权威与秩序，权威主义成为俄罗斯改革发展的现实选择。整顿秩序、突出国家观念、强化中央权威，是普京上台后需要迫切完成的

任务。普京推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措施，打击了分裂主义与寡头势力，建立了强大的执政党与政府。正如普京所强调的，俄罗斯自建立伊始就是一个超级中央集权国家，这一点已深深地根植于俄罗斯的传统及其民众的思想之中。俄罗斯通过不断强化中央力量和国家权威，建立了权威主义的政治秩序，取得了显著成果：

通过对中俄改革的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任何国家的发展都必须遵循其历史文化传统，任何违背发展规律的超越带来的不是繁荣而是灾难。即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历史上，也都经历了权威主义政治秩序主导的发展时期，为国家的民主化转型与现代化进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中俄这样深受传统历史文化影响的后发现代化国家，权威主义更能发挥巨大的作用。

几乎所有的现代化理论都指出，**政治稳定对于一个国家的转型与现代化是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和政治秩序可以提供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稳定。**在改革过程中，中国改革坚持了政治秩序的稳定与执政党的权威，以最小的代价推动了社会的转型。苏联和俄罗斯的改革破坏了政府的权威性与合法秩序，没有发挥出执政党应有的社会调控和保障稳定的功能，导致社会长期动荡不安。权威主义是在告别极权制度而新的社会秩序尚未确立的情况下的重要政治秩序。这种政治秩序有力地抑制了国家转型时期出现的社会矛盾冲突与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有利于在稳定的条件下推动社会发展与政治改革。

政治稳定对于一个国家的转型与现代化是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和政治秩序可以提供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稳定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文章摘编自《前沿》2013年第9期）